

鄧小平和我們這一代

郝鐵川

題記：這是我於2004年8月30日在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後來被用作拙著《鄧小平與中國的民主、法制和人權》一書的序言，該書去年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我之所以今天發表舊作，是因為不少香港的朋友問我：「你怎樣由一個學者轉變為官員的？」這篇舊作可以從一個角度回答朋友們的所問。我想說明，在改革開放的今日中國，內地早已是利益群體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信息來源多元化、價值觀念多元化，人們在思想觀念方面的獨立性、選擇性、多樣性、複雜性日益增強，我和許多同齡人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是我們獨立自主選擇的結果。「我思，故我在」。儘管我十分懷念過去12年的大學教書生涯，迄今也不願意完全丟棄學術研究的習慣，但我對當年邁出校園、投身社會活動的抉擇毫不後悔。因為作為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知識分子，先哲「立功、立德、立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遺訓常常縈繞於懷，我總覺得蒼天之上先哲的慧眼在望着我們：中國文化人的風骨薪火相傳了嗎？

世界上並沒有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早年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青年黑格爾派的一員；列寧早年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在對民粹主義的思考、批判中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後來又在革命實踐中逐步創立列寧主義的；毛澤東早年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信奉過康有為，追隨過孫中山；鄧小平也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曾經相信過科學救國、工業救國；同樣，我們這一代人也並非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在鄧小平和鄧小平理論的引領下，信仰了馬克思主義，決心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奮鬥終身。

鄧小平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導師。

——是鄧小平把我們這一代人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中解放出來，告別「左」的歲月，過上了正常的生活。

我們這一代，屬於眼下的中年一代（60年代出生）。少年時代，我們遭遇了「文革」，社會灌輸給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錯誤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因此，那時我們心中的馬克思主義主要就是「造反有理」一類支離破碎的語錄片斷。

當時，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指導下的社會實踐，也極容易讓我們接受那些語錄。1966年「破四舊」、揪「走資派」；1967年「打派仗」、「文攻

武衛」；1968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969年「鬥、批、修」、「清理階級隊伍」；1970年「廬山會議」；1971年「九、一三」事件；1972年關於林彪反黨集團是極「左」還是極右的爭論；1973年至1974年的批林批孔；1975年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和評《水滸》；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一連串的事件，使我們用了不少「左」的實踐檢驗了我們所知的「經典語錄」和「左」的理論。

當時的我們年輕氣盛，激情澎湃，這種年齡使我們對狂瀾突進的「革命」、「造反」很容易傾心。感謝鄧小平，是他在粉粹「四人幫」以後撥亂反正，使我們明白了毛澤東所說的：世界上有香的馬克思主義，也有臭的馬克思主義。「文革」中灌輸給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有些是指導革命奪權而不是指導建設、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有些是歪曲、片面理解和詮釋的馬克思主義；有些是文字翻譯錯誤帶來的馬克思主義。更重要的是，鄧小平把階級鬥爭納入法治軌道，廢止以階級鬥爭為綱，不再搞「左」的運動，使我們知道了我們還可以有「文革」之外的活法。回首往事，我們真的是發自肺腑地唱道：「再也不能這樣活，再也不能那樣過，生活就得前思後想，想好了你再做。」（電視劇《轆轤·女人和井》片尾歌）

——是鄧小平把我們這一代人從對西方文化的頂禮膜拜中解放出來，避開了右的漩渦，免去了蘇東那樣的社會動盪。

我們這一代告別「文革」之後，在信仰領域確實出現過迷茫。「文革」十年給我們灌輸的那套價值體系

被拋棄了，新的價值體系在哪裡？當我們發現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並非完全是「日落西山、氣息奄奄」時，當我們意識到「文革」之禍與中國近代缺乏西方近代那樣的啟蒙歷史有關時，再加上20世紀80年代西方對我國的策略有別於80年代末和90年代，我們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會把思想的天平倒向「全盤西化」。

感謝鄧小平，是他在我們頭腦還未完全清醒的時候，發出了「中國不能亂」的警告，提出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主張。而我們真正理解鄧小平理論的深刻內涵，是在蘇東劇變之後。蘇聯為什麼解體？解體之後為什麼內亂不斷？我們這一代不管政治信仰如何，絕大多數都是愛國主義者，絕不希望國家分裂、民族衰弱、社會動盪。看到蘇東劇變，我們深深地理解了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堅定立場，深深地感謝鄧小平使中國沒有發生蘇聯那種國家分裂、衝突頻仍、生靈塗炭的悲劇。

鄧小平對「左」的批判，使我們的生活走上了正常軌道；鄧小平對右的防範，使我們的生活避免了對正常軌道的脫離。我們這一代在經歷「左」一右的碰撞之後，真正服膺了鄧小平理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生今世，我們這一代再也割不斷與鄧小平的深厚情緣。在鄧小平誕辰百年之際，我們樹立自己的心路歷程，感悟導師的思想遺澤，不知九泉之下的小平同志是否感到欣慰？（原載《解放日報》2004年8月30日）



郝鐵川

「有守有為」應先守護一國原則

青鋒

反國教無疑是自斷炎黃根

林奮儀

特首梁振英首次在新一屆立法會講述他的施政理念，用了較多的篇幅談論香港與內地關係，提出發展與內地的合作須「有守有為」，這與他參選時提出「穩中求變」思路應是一脈相承的。其中最令人讚賞的一段闡述是：香港是在「一國兩制」下自治，是根據《基本法》實質規定的高度自治，「不是其他形式和內涵的自治」，「政府會繼續堅持基本法賦予的高度自治」。但近來香港出現的赤裸裸「反國教」、「去中國化」和「港獨」歪風，是對一國的強烈衝擊，特首和政府應堅定捍衛守衛一國的基本原則，不能讓反中亂港者胡作非為。

《基本法》對香港高度自治的實質規定是甚麼？

其一，是第一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在1997年已經回歸祖國的懷抱，因此，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社會人等，均須維護這一國家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之原則。在此原則下，在中、小學生開展國民教育乃天經地義應做之事，將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和發展、變遷和自己身份的歸屬、認同歪曲為「洗腦」、「赤化」而加以反對，是背離《基本法》最實質的規定的表現。

其二，《基本法》第二條規定：香港的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的。這就界定了香港一切權力的來源和國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主從關係，高度自治不是「自決」，司法獨立不是「法官治港」，更不是「香港獨立」。梁振英的「有守」，就是要守住這「一國」的實質規定。因為守不住「一國」這個原則，香港就會族群分裂，社會就會大亂，一切安定繁榮和發展將無法實現，政府要「有為」也成空談。

其三，「其他形式和內涵的自治」指甚麼？反對派尤其是公黨和「人民力量」的議員應該自省：所謂「在正當的政治運動中爭取分裂的合法性」、香港要「高度自決」、「五區公投」、「全民起義」或鼓吹甚麼「獨立政治實體」都屬其他「形式和內涵」，應予否定；有人高揚港英殖民管治龍獅旗、高喊「香港獨立」、「中國人滾回去」是徹底背叛自己國家的亂臣賊子，與「一國兩制」原則下的高度自治完全背離；策劃、組織、支持這些分裂活動就是中國人民的公敵。特區政府的「有守」，就是要守護五區紅旗這面旗幟不被褻瀆，守護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否則，一切「有為」都成無為，梁振英必須理直氣壯向香港人講清楚。

其四，管治香港要「有守有為」除守住「一國」原則別無他守。所謂「法治核心價值」和「民主、自由」，若香港被「港獨」勢力分裂出去，則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將半途而廢，法治也蕩然無存，民主、自由將會泡湯。因此，梁振英的施政理念必須為守護「一國」的原則大聲疾呼才能高屋建瓴、勢如破竹！

以黃之鋒為首的一群「學民思潮」小子在反中政教唆下，牙牙學語：「反對國民教育」。其數典忘祖、抗拒回歸所表現的稚氣和野性與印度傳說的「狼孩子」不相伯仲。

印度「狼孩子」其實是人類嬰兒，只因自幼被母狼叼去，並喝狼奶成長，於是失去人性。及至獵人救出，把他送去孤兒院，仍長久脫離不了野性，終日學狼爬、狼嚎，很難接受母語和文明教育。這和「學民思潮」小子真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同之處僅是「狼孩」徹底擺脫了同狼的關係，因而不留後患。但黃之鋒一類學子即使香港回歸祖國母體之後，一直剪不斷斷前朝餘孽的瓜葛，並被他們牽扯着走上反中亂港之路。其反噬母體的野性比狼孩有過之而無不及。面對如此一群桀驁不馴的小子，如果魯迅活到今天，一定再次疾呼：「救救孩子！」

魯迅擔心封建禮教荼毒青年一代，曾寫《狂人日記》，借狂人之口揭發封建禮教之弊。今時香港封建殘害式微，但代之而興的是殖民主義洋化禍港。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年矣！不少學校仍「英」魂不散。假洋鬼子登壇說教不絕如縷。他們趕趁「五十年不變」而加緊復辟，洋化學生。他們照搬英皇制誥、皇室訓令，言必稱英，語帶反中。學生受其感染，又怎不連連夢囈也叫着「去中國化」、「反對洗腦教育」呢？

香港「教協」和「學聯」，前者統領香港絕大多數教師，後者牽制着各大專學校學生。為了配合反中政教開拓票源，這兩個團體的少數人不惜為虎作倀，降師長、學長之尊而發動和參與學生為反國民教育的絕食、遊行、罷課活動。他們哪兒像個教師和學長？起的完全是母狼作用，是要將學子叼入狼窩，令他們失去理性，以便引發更多狼戾、狼抗，從而嚇窒政府，不敢推行國民教育，不敢議行二十三條立法，任由他們搞復辟、搞「港獨」。

可憐的黃之鋒一類學子，他們本來是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後裔，是偉大的文明古國龍的傳人，如今竟然在不知不覺中被人切斷了炎黃祖先的根，換上了英國蠻夷的脈，還要學着狼嚎、狗吠「反對國民教育」。對此無知小子，還是以魯迅之對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來提醒他們吧。但阿Q雖愚頑，尚不至數典忘祖，還常常以「我祖先比你闊」來做視假洋鬼子同類人物。而今「學民思潮」小子竟假洋鬼子為師、視前朝餘孽、漢奸、走狗為教父，彼此狼狽為奸，無非是想重新匍匐於女皇像下接受國民教育而已。猛醒吧，香港版的狼孩子！學狼嚎是無法阻止港人融入祖國大家庭的。

不能打開香港社會福利的潘朵拉盒子

陳紹雄 工程師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常務副主席

專業建言

以目前香港稅率之低，稅基之窄（公司利得稅16.5%，薪俸稅標準稅率15%），根本沒有條件開設一個金額倍增，又無須供款，無須設資產限制關卡的可持續退休福利制度。除非，香港人已準備好接受大幅加稅。回歸15年後的今日，陳佐洱先生在香港為其新書舉行發佈會，或許是想再次提醒香港人，不要打開社福這個「潘朵拉盒子」，以免香港社會「車毀人亡」。

在香港回歸前擔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前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在最新出版的《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一書中提到，時任港督的彭定康大幅提高社會福利，年增長達百分之二十七。他認為此番舉措會對特區政府極其不利，因此在專家小組會議上指出，「港英的各項社會福利開支突然變成了一輛在崎嶇道路上飛奔的高速賽車，他如果繼續這樣往前開，不用多少年，將會車毀人亡，而車上坐的正是六百多萬香港老百姓啊！」

「車毀人亡」論仍具警惕作用

陳佐洱的「車毀人亡」言論，在當時引起不少爭議，而在爭議當中，這種善意的忠告發揮了作用，特區政府避免了背負龐大社福開支的包袱，《基本法》中亦列明，特區政府須遵守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

回歸15年後的今時今日，陳佐洱先生在香港為其新書舉行發佈會，或許是想再次提醒香港人，不要打開社福這個「潘朵拉盒子」，以免香港社會「車毀人亡」。

事情是這樣的：政府建議，日後65歲或以上長者，只要所擁有資產不超過18.6萬、月入不逾6,600元，每月便可領取2,200元的生活津貼，較一般領取1,090元生果金的長者，多了一倍。不過，政府的建議隨即激起立法會各黨派的爭辯，工聯會、工黨、民主黨及民協等要求政府撤銷70歲或以上長者須申報資產的要求；民建

聯、公黨和自由黨則認為要提高資產水平上限。

長者生活津貼的原意，是幫助一些低收入長者，紓緩他們的生活壓力，這可視為政府扶貧的一種手法，將這種扶貧手法視為退休保障，確實是一種誤解，否則，合資格人士也不會只有2,200元這麼少。在如此前提下，設立審查機制就顯得合乎情理，難道一些富豪也需要2,200元來紓緩生活壓力嗎？

有人會這樣認為，香港目前擁有數以億計的儲備，難道不能承擔相關的開支，讓長者過着「尊嚴」的生活。事實是這樣的：香港目前擁有龐大的儲備，正是堅守「量入為出」的成果，若果輕易放寬，不單社福開支，其他如教育、醫療等，為何不能承擔更多的開支呢？

應研究提高資產上限

以目前香港稅率之低，稅基之窄（公司利得稅16.5%，薪俸稅標準稅率15%），根本沒有條件開設一個金額倍增，又無須供款，無須設資產限制關卡的可持續退休福利制度。除非，香港人已準備好接受大幅加稅。另外，香港正面對人口結構的轉變，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推算，2039年，平均每4人，便有一人是65歲以上的長者。

「立法會有票無權，政府有權無票」，這是目前行政、立法關係的寫實照。在日漸走向民粹的今日，各黨派提高「叫價」，似乎是無可厚非。當然，有部份黨派是想迫令政府提出全民退休保障，但是，「今日埋單，下一代找數」，又是否香港社會之福呢？

政府目前的表態似乎是「企硬」，與政黨玩「Show Hand」，博政黨不敢否決政府的建議，以免長者全失。老實說，一名長者，辛勞半生，晚年手執十多二十萬儲蓄，比比皆是，現時物價騰貴，18.6萬資產上限水平，絕對是過低。因此，政府與政黨應研究提高資產的上限，才是正道。



陳紹雄

蘇偉文 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蘇偉文

香港現在有兩個免費電視台，和其他先進城市比較，在數目上其實並不算多；然而，以香港作為七百萬人口的城市，再加上免費電視台在華南地區有不少的觀眾，香港免費電視的市場其實是很大的。在這個論據上，香港是有條件去支持多家免費電視台的，可是在開展免費電視台這方面，香港卻沒有多少的進展，到了目前仍是只有兩家免費電視台，對不能負擔收費電視的觀眾來說，無異是少了選擇。

在七十年代，香港有三家免費電視台，即現在兩家免費電視台再加上已倒閉的佳藝電視，其中佳藝電視在啟播三年後關閉。當然，佳藝電視的關閉有很多原因，經營不善是一個主因，但政府因素卻不無關係，因為佳藝電視在發牌要求上有一個獨特之處，就是在每日黃金時間內有兩小時的成人教育節目；而且中途不能插播廣告。這個要求等

加快審批免費電視台

於局限了佳藝電視的盈利來源，對新的免費電視台來說，無異是在失了先天優勢下再被迫陷於苦戰。在香港的廣播歷史之上，曾經是有過三家免費電視台。

電視台需求與日俱增

對香港的市民來說，能夠多一家免費電視台作為選擇，其實利大於弊，尤其是對低下階層來說，他們負擔不了收費電視的費用，只能以免費電視來作為民間辛勞了一天後的娛樂。可以讓市民多一個選擇，無異令大眾的生活條件提高，從這個角度看，筆者實在不明白為何在審批免費電視台時會如此冗長。

現時反對多增免費電視台的論據，主要是以為目前的免費電視台已足夠，多加免費電視台會令節目質素下降，和令免費電視台的人才不足。對這個論據，筆者非常不以為然。

首先，香港的免費電視台在數量上是否足夠，其實是有商榷之處。以目前兩家免費電視台的市場環境來說，在香港人口還是四百萬人的時候，到了香港人口七百萬人的時候，四百萬人口的城市可以有兩家免費電視台，當人口數目上已上升了一半多，理應是在免費電視台的需求上增多了，為何會是人口上升了反而免費電視台會變得足夠？以七十年代時期的香港為例，當時香港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狀況，尚可容許三家免費電視台存在，甚至三家免費電視台可以營運上

三年，由此觀之，香港的免費電視台其實是有空間的。

引入競爭改善節目質素

而且，免費電視台數目和節目質素是兩個問題，將之混為一談其實是轉移問題焦點。電視節目質素的好壞，在乎節目製作人的投入，關乎電視台願意投放多少資源在節目製作上。香港觀眾的要求已越來越高，假如電視節目的質素不佳，他們自會轉往其他娛樂途徑，根本不用為此擔心。反過來看，只有兩家免費電視台的今天，反而會因缺乏競爭而令電視台的節目製作水平停滯不前。

至於人手不足，更是難以令人明白和理解，因為在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香港，電視工作是一項專業，當多了免費電視台時，自然會向外招攬人手，人手不足自然會發生。但當人手不足帶動薪金上升時，就會吸引人手入行，對行業做大做強其實有好處。若果害怕人手不足而裹足不前，香港在其他方面也不用發展，因為這代表會引來人手不足的問題。根據這個邏輯，是否我們不要建新的公屋，因為新基建會導致建築業人手不足；是否我們不要建新的醫院，因為新醫院會導致醫療界人手不足？

所以筆者贊成多加免費電視台。至於新免費電視台是否成功，則是營運者的商業風險和考慮，我們不應以一些惡空想像的理由來阻礙免費電視台的發展。